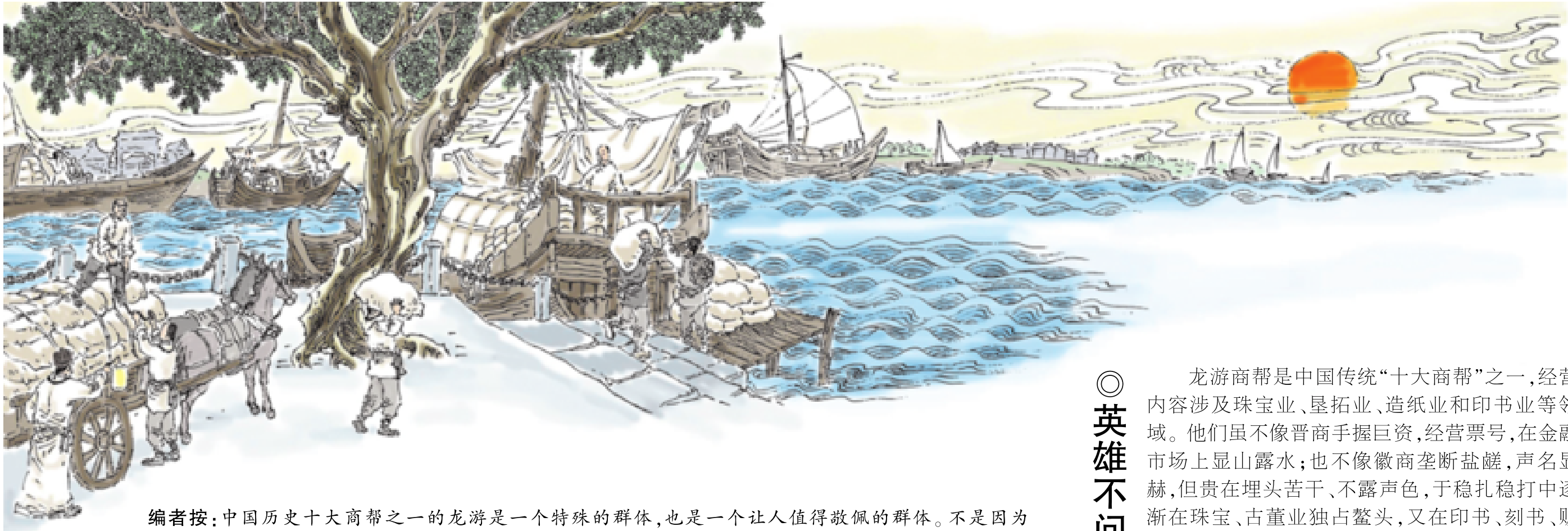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编者按:中国历史十大商帮之一的龙游是一个特殊的群体,也是一个让人值得敬佩的群体。不是因为 他们赚了大钱,而是因为不畏艰难的精神。他们虽地处偏僻,却有着开放的心态,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,他 们不排斥外地商帮的渗透,并且相处友善,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……在第三届龙商大会举行之际,本报带 你走进龙游商帮的历史长河,倾听有关他们的故事。

龙游商帮 平民贵族

◎杨梓润

◎一条官道打入商海

浙商群体虽多,但其中最与众不同的就是龙游商帮,据考证,它是浙江最早的商人群体。龙游商帮之所以与其他商帮不同是因为它既无官府支持,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后盾,但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,自立于商帮之林。单从字面理解,大概很多人都会误以为龙游商帮仅指浙江省龙游县的商人,其实龙游商帮包括了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、常山、西安(今衢县)、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,但因这些商人中以龙游商人数最多,且最具经商头脑和手段,因此被冠以龙游商帮。

龙游商帮崛起于徽、晋两大商帮角逐商海霸主之位时,带着点“鹬蚌相争,渔翁得利”的意味,龙游商帮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了历史舞台,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蜕变为不容小觑的大商帮。龙游商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,用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来形容这个过程倒是颇为恰当。

龙游商帮发轫于南宋,宋室南迁后建都杭州,为方便与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,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,西接湘赣的官道,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县。龙游县位于浙江省西部,金衢盆地中部,北靠建德,东临金华市区、兰溪,南接遂昌,西连衢江区,是浙江东、中部地区连接江西、安徽和福建三省的重要交通枢纽,素有“四省通衢汇龙游”的说法,因此南宋官府修建的这条管道就成为了龙游人跨入商海的重要途径。

龙游县土地资源充沛,森林覆盖率极广,因此也有“中国竹子之乡”的美誉。

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,龙游商人通过官道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,以此获利,积累了一部分原始资金,催生了一些大商人,并开始到浙江以外的地方经商,龙游韦塘人朱世荣就是如此。有史料记载其“流寓常州致巨富,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,后归衢江古码里,复大置产,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。”随着时代变迁,原本只是部分在外经商的龙游商人开始大批走出故土,到全国各地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域,至明天启年间,“龙游之民,多向天涯海角,远行商贾,几空县之半。”这些走出故土的龙游人中成为巨商大贾的大有人在,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,“一往返旬月,获利必倍,岁得数万金,自是兄弟更相往来,垂 20 余年,遂成大贾。”

因此,在明朝,一个以龙游商人作为中心,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群体终于闪亮登场,并以“遍地龙游”的气势自立为帮。



◎财自道生 利缘义取

也许是因为没有过硬的宗族势力作后盾,也或者是因为从不用忌惮官府,龙游商帮在经商过程中反倒更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,他们坚持以“财自道生,利缘义取”为原则,诚信为本的儒商品格让他们很快就与当时“无徽不成镇”“钻天洞庭遍地徽”的徽商并驾齐驱。以严把质量关的“西山傅立宗”和以信誉著称的龙游“姜益大棉布店”都是这方面的典范。“西山傅立宗”由龙游商人傅家来创建,傅家来眼光长远,从初涉商海之际就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产品质量的重要性,因此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立身之本。除了在产品的选材、制作过程中精益求精以外,傅家来还从每一个造纸环节入手,对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,绝不允许一个有瑕疵的产品出售,而且同样的纸张,“西山傅立宗”因为选材苛刻,因此总比其他纸号的要重个十来斤。为了表示对用户的责任感和维持良好的信誉,“西山傅立宗”的产品都印有“西山傅立宗”的印记,这在无形中起到了塑造和强化品牌意识的作用。

以信誉著称的“姜益大棉布店”在诚信上的体现方式虽与“西山傅立宗”不同,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“姜益大棉布店”由龙游商人胡氏创建,到胡氏传人胡筱渔接管时更为重视信誉,他以诚实守信教育每一位职工。为了防止流通中有银元掺假损害顾客利益,胡筱渔特别聘请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,对每一块在“姜益大棉布店”流通的银元进行专业的检验,并规定凡经过他店里的银元都要加以“姜益大”印记,让顾客放心。

胡筱渔注重商号信誉,为了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宁愿承担暂时的损失。有一次,“姜益大棉布店”在海宁订购了 7500 匹石门布,价值 6 万银元,在运输过程中货船遭劫,这本不关姜益大的事,且海宁布商亦立即派人来龙游处理此事,主动承担损失,但重义守信的胡筱渔不仅当场偿付了对方 6 万元布款,还再订购了 7500 匹棉布,并热情款待海宁布商,这一义举让“姜益大棉布店”

知名度迅速攀升,成为当地的“标杆企业”。海宁一事,在以后的经商活动中,凡碰到货物紧俏时,海宁等地布商都首先满足“姜益大棉布店”的货源需求。胡筱渔靠着自己的重义守信获得了远超 6 万元的回报。

◎英雄不问出处

龙游商帮是中国传统“十大商帮”之一,经营内容涉及珠宝业、垦拓业、造纸业和印书业等领域。他们虽不像晋商手握巨资,经营票号,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;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鹺,声名显赫,但贵在埋头苦干、不露声色,于稳扎稳打中逐渐在珠宝、古董业独占鳌头,又在印书、刻书、贩书业和海外贸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,成为了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。

无论是发轫之初,还是鼎盛时期,龙游商帮都无背景、无靠山,这和在发迹之后便与官府产生错综复杂、盘根错节关系的其他商帮有着本质的区别,因此如果要论出身地位,龙游商帮应该算是“平民式贵族”。虽然晋商和徽商中大多数巨商大贾也多是平民百姓白手起家,但能走到最后都与官府撇得一干二净的商帮却非龙游商帮莫属。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始至终都与官府撇得一干二净,在最为鼎盛的明代,龙游商帮的一举一动都对当时的统治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

史料《皇明条法事类纂》记载,在明代,为了应对各地日益壮大的商帮团体,龙游商人在北京建起了会馆,还与江西安福地方商人合计五万余人,跋山涉水到云南姚安经商垦荒,这样大规模的迁移经商引起了明朝政府的恐慌,以至于在明成化年间,政府多次发文通令浙江、江西两地,要求遣返这批徒流边疆的商人。由此可见,当时明政府对龙游商帮的忌惮之心。

龙游商帮所处地域偏远,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观念闭塞、固步自封,反倒具有开放的心态和新潮的观念。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,即他们在投资上的“敢为天下先”和“海纳百川”的肚量。明清时期,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、借贷业,而龙游商人却因心态开放、观念新潮而果断投入到纸业、矿业的商品生产中,他们还直接参与商品生产,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,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。

驰骋于商界的龙游商帮足迹遍及全国各地,大多从事长途贩销活动,据有关文献记载:明成化年间,仅云南姚安府(即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)就聚集了浙江龙游商人和江西安福商人三五万人。“英雄不问出处”,不管龙游商帮的出身如何,也不论它是多么行色匆匆地从历史大舞台中退场,龙游商帮都是一支被时代认可的“管用”的商帮。(摘自《光彩》2013 年第 12 期)

